

# 解答有关修辞的几个问题\*

——一九六二年十一月十九日在

复旦大学语言研究室的讲话

陈望道

要了解《修辞学发凡》，可以看看一九三二年以前出版的修辞学和作文法等书，把《发凡》同它们进行比较。也可以看看文学史，了解一九三二年前的政治形势。那时有人提倡复古、存文、读经，说古文可以修辞，白话不能修辞。《发凡》是参加了当时战斗的。我那时写这本书是有目的的，我力图用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观点来解决修辞上的问题。当然，书中没有明确提到马克思主义，因为提到马克思主义是有杀头危险的。我们今天要用历史主义的观点来看这本书。

《发凡》写作的背景是这样的：二十年代末到三十年代初期，我担任复旦大学中文系主任。当时的反动统治者对进步力量镇压得很厉害，c.c.派也拚命鼓吹复古。我利用上修辞学课的机会，在课堂上巧妙地骂他们，听的人很多，开始在小教室讲，后来改在大教室，很受欢迎。我在讲台上嬉笑怒骂，他们也抓不住把柄。元代王若虚的《滹南遗老集》中有不少地方是批评古文的，但这本书历来不受重视。我把它抬得很高，引了书中不少批评经书、批评唐宋八大家的话，用古人打古人的方法，来反对复古。

当时有个人叫胡怀琛，写过一些修辞书，但宣扬只有文言

\* 这是陈望道先生解答复旦大学语言研究室同志提出的有关修辞学几个问题的讲话。

文才能修辞，白话文不能修辞。他的哥哥当时是国民党当局抓文化的。《发凡》中对柳宗元《柳州山水近治可游者记》的分析，就是批评胡怀琛的看法的。胡怀琛在文章中将墨子说成是印度人，茅盾著文批评他，他气势汹汹地责问茅盾，要茅盾登报道歉。我用晓风的笔名，在《申报·自由谈》上写文章批评胡怀琛，用的就是柳宗元这篇文章的例子，胡怀琛把它分析错了。

那时的修辞学界讲修辞一定要讲文言文，一定要讲修饰，讲雕琢，不问内容。我却反对修饰，讲究调整。其实调整也是修饰。为了区别当时的修饰，要进行战斗，我才提调整。调整有两种：一种是积极的调整，如“百花齐放”的“百”和数学上的一百不同；“一天骂三场，二天打八顿”的“三”、“八”和科学上的一是一、二是二也必须区别开来。这种随情境而变的用法是调整。另一种是消极用法的调整，但也是调整。这两类不能混淆。消极是对积极而言的。有人觉得“消极”两字不好。名称要改也可以，我也曾考虑过用别的名称，但未想出更好的。必须用两个对立的词才行，一定要体现出对立来。

总之，写这本书是想用马克思主义观点来分析修辞现象。当时马克思主义的书介绍进来的很少，把马克思主义观点运用到学术上是要化时间的。

我写《发凡》的“本钱”：一是学过一些外国修辞书；二是小时候读过四书五经，受老师的影响很大。我的老师是秀才，专写清真文章，文笔简炼；我的舅舅也是秀才，爱写华丽文章，讲究语言的形体、声调美。同时因为我学过马克思主义，就用内容决定形式的原理向形式主义进攻。我还学过心理学、美学、逻辑学、哲学等，这些学问都对我帮助很大。《发凡》中的“观念”一词等于“概念”的意思，在心理学上，这两个词

是通用的。它们有时严格区分，有时又可以不分。将来也可以改一改。

我过去是学物理的，后来学政治法律，是法学士。那时有人说中国语文没有规则，比外国文低一等，为了出一口气，我就研究修辞和文法。

《发凡》的写作非一人之功。邵力子是个热心的读者，我写好一篇，他就看一篇。刘大白对我的帮助更大，他贡献了许多奇怪的、不易找到的材料，如回文等。还有几个学生也很热心，过几天就给我一些例句。这本书出版后有一定的影响。巴金前几天还对我说：“你这本书在当时是有创造性的。”

叶圣陶曾经称赞过《发凡》中的“修辞对写说的缘分最浅”这句语，认为很精当，也很实事求是，不象有些人一味吹嘘自己的东西。其实，修辞与阅读欣赏的关系最大，对写说的作用则次之。修辞学家的修辞不一定好，因为写说是要适应题旨情境的。只有适应当时的题旨情境的修辞，才是好的修辞。

修辞是变的，但我们要找出它不变的东西。古时以泰山言高，现在知道珠穆朗玛比泰山高得多，现在用比喻，就应该改变。它的不变的东西是规律，是修辞要依据题旨和情境。要找出它不变的东西——规律；也要找出它变的东西——说明规律的内容。

研究修辞要同时代联系，才有力量。解放以来，特别重视修辞，我们的党很希望拥有一批修辞学家。人代会上，对“发愤图强”、“发奋图强”还是“奋发图强”讨论了好久，最后还是用了后者。我对此也发了言。党为什么重视修辞、提倡修辞？因为这也是宣传工作。

讲修辞不能只讲辞格，也要讲理论。现在有人不问理论，光谈辞格，而且不和内容联系起来，这是古代的老路，不是

新路。

学修辞的目的一方面是总结人家的修辞，一方面是为了运用修辞。

修辞是在材料配置定妥之后，才产生修辞过程的，不能把概念扩大。

修辞是格局无定的，我反对呆板的格局。有人主张讲格局，讲出那几种开头结尾好，也是可以的，但不能概括无余。

有人讲积极修辞就只讲变态、破格。好象只有变态、破格才好，绝对的好。这是错误的。为了适应题旨情境而超常越格才好。不能为形式而形式。有的也有玩弄形式的，但文章的目的不在此。

文风问题、风格问题可以搞。学术问题只要材料丰富，观点正确，总是可以找出规律来的。

（本文系宗廷虎同志一九八二年根据当时记录重新整理，标题为整理者所加。）

# 修辞研究必须用马克思主义 观点作指导\*

——学习《修辞学发凡》札记

胡裕树 宗廷虎

我国修辞学发展的史实，雄辩地证明了这样一条历史经验：当修辞研究用马克思主义观点作指导时，它的发展较快，成就较大；当修辞研究被囿于其他种种非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时，它的发展较慢，成就较小。

从历史上看，我国古代的修辞理论和对修辞现象的收集，虽然丰富多彩，殷实有力，其中且多真知灼见；但总的说来，还是零珠碎玉，不成体系。科学的修辞学体系迟迟未能建立，原因当然很多，但我们认为，其中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由于缺乏先进的观点作指导。“五四”前后，西方和日本的修辞学传进来了，我国涌现了一些现代修辞学著作，但较长一段时间都停滞在机械模仿上，新的局面较难打开。其所以如此，也是由于没有先进的理论作指导。陈望道先生的《修辞学发凡》（以下简称《发凡》）一问世就被公认为在我国第一个建立了比较全面而科学的修辞学体系，其中重要的因素就是作者运用了马克思主义观点作指导。

一九六二年十二月十七日，望道先生在复旦大学召开的纪

\* 本文是《用辩证法指导修辞学研究——纪念 修辞学发凡 出版五十周年》（中国修辞学会首届年会论文，刊于《复旦学报》1982年第3期）的续篇。

念《修辞学发凡》问世三十周年座谈会上讲话时，郑重地说过：“如果这本书还有一些可取的地方，则是运用了马列主义观点的原故。”这是他经验的总结。

望道先生早在“五四”以前在日本留学时就接触了马克思主义。回国后，1920年翻译了《共产党宣言》，这是我国第一个全译本。后来，他发表了宣传马克思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观点的著译多种。望道先生对马克思主义素有研究，造诣很深。他把马克思主义观点引入修辞学领域，这在我国，还属首创。正因为这样，他的《修辞学发凡》能以崭新的面貌，博得学术界的好评。

在当时，《发凡》是不可能公开引用一句马克思、恩格斯或列宁的话的，但由于作者深谙马克思主义的精髓，马克思主义观点被融进了全书各个章节之中，这些，我们在《用辩证法指导修辞学研究》一文中，已经说明过一部分，现在再就其他几个突出的方面作进一步阐述。

## 一 全面的观点

作者在研究中贯彻了对立统一观点，总是考虑到问题的两面或多面，因此《发凡》一书对各种修辞问题能够做到全面的分析。这一点，他曾经对我们作过介绍：“《发凡》与别的书不同之处”，其中之一是“比较全面”。

《发凡》的全面性表现在很多方面，主要有以下几点：

第一，既研究修辞理论，又研究修辞规律。

讲修辞，不讲或很少讲理论，这是一些修辞论著常犯的毛病。有些书能在绪论或结语中简单地讲几句理论，还算好的；有的干脆只讲辞格。久而久之，令人造成这样的印象；修辞只研究辞格，辞格等于修辞。

几十年来，望道先生一贯反对这一点。他的老朋友乐嗣炳教授曾经说：望道先生写作《发凡》时，是“长时间思索着修辞学理论”的。十年动乱前，望道先生也多次告诫我们：“讲修辞不能只讲辞格，也要讲理论。现在有人不问理论，光谈辞格，而且不和内容联系起来，这是古代的老路，不是新路。”确实如此，我国古代的学人往往只注意收集修辞现象，但上升到理论的工作做得不够，这也是我国古代修辞学未能更上一层楼的重要原因。望道先生能总结出这一点，确乎有与众不同的眼光。

《发凡》的修辞理论，概括起来说，有以下特点：

首先，它讲清了修辞的基本原理。其中包括：正确解释了“修辞”的含义，分析了“修辞”在语辞使用和语辞形成中的位置，回答了修辞研究的对象、任务和功用问题，阐述了修辞问题旨情境的关系等等。象《发凡》这样，对修辞学的基本原理讲得如此透彻而全面，在《发凡》之前问世的修辞学著作中，固然未曾有过；即使在《发凡》之后出版的修辞学著作中，也不多见。

其次，它把某些相关学科的理论，也大量吸收了进来，这就更加丰富了修辞学理论。例如它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观点来分析修辞现象，仅仅从第十篇“修辞现象的变化和统一”等章节的标题上，人们即能看出其独到之处。又如，在第二篇的有关章节中，他运用了语言学理论来阐明“修辞和语言”的关系，刘大白在《发凡》序言中很赞扬这种“以语言为本位”的“根本观念”，并指出这是“此书底特点”。另外，《发凡》关于内容和形式关系的分析，既符合哲学原理，又符合文学原理。其他如美学理论、心理学理论等，也在全书中有所体现。

再次，《发凡》的修辞理论分布的面很广，不仅在第一篇

《引言》和第十二篇《结语》中有，其余各篇也都有。例如第二篇《说语辞梗概》中包含语言学理论已如前述。第三篇《修辞的两大分野》首先讲述了两大分野理论。第四篇《消极修辞》首先讲述了消极修辞理论。第五篇《积极修辞》首先讲述了辞格理论。第九篇《辞趣》首先讲述了辞趣理论。第五至第九篇主要是论述具体修辞手法的，在给这些具体手法下定义时，往往又将具体的理论夹杂其中。在具体辞格的“备览”、“附记”中，往往又引用了众多的古代学者精辟的修辞理论。而第十一篇，则首先讲述了文体或辞体理论，等等。

总之，“研究修辞一定要有理论”，这是望道先生的切身体会。直到晚年，他始终坚持这个看法，这是值得我们重视的经验。

恩格斯曾经指出：“一个民族想要站在科学的最高峰，就一刻也不能没有理论思维。”<sup>①</sup>修辞学想要发展到它的“最高峰”，不研究修辞理论，不依靠理论来指导，也是不行的。

《发凡》在重视理论的同时，也重视修辞规律的全面研究，这一点，下面还要谈到。

第二，既重视积极修辞的研究，也重视消极修辞的研究。

《发凡》把修辞现象一分为二。凡能使语辞呈现生动、形象情貌的，称为积极修辞；凡能使语辞呈现明白、清晰情貌的，称为消极修辞。这样的分析，比较符合客观实际。这与有些修辞学著作只承认积极修辞是修辞，不承认消极修辞也是修辞，形成了鲜明的对照。例如有一本修辞书是这样对修辞学下定义的：

使用各种巧妙而有效的方法，把语文修饰得美丽生动，以加强它抒发情感、表达思想的功能，这就是所谓修辞。在这里，作者认为，修辞仅仅是为了“把语文修饰得美丽

生动”。那么，把语文调整得明白精确，该由哪门学科管呢？如果修辞学不管而让别的学科去管（其实别的学科都没有管），这就把语文的全部运用，人为地分裂成两半，修辞学只能管其中的一半，甚至连一半也不到。《发凡》认为，修辞既是讲究“语辞的调整或适用”的，那么“华巧并不算是修辞的唯一的目标。这用古话来说，便是所谓‘文’外还有所谓‘质’。用我们的术语来说，便是积极的修辞手法之外，还有消极的修辞手法。”<sup>③</sup>这是因为，把语辞调整得生动华美，只是修辞学要研究的一个方面的问题。只有把研究语辞调整得明白精确也算在内，修辞的探讨，才比较全面。

这从古今中外名家的论述中，也可找到类似的看法。二千多年前，孔子就既主张“言之无文，行而不远”<sup>④</sup>强调言辞只有具有文采，才能流传久远；又主张“辞，达而已矣”<sup>⑤</sup>，强调言辞必须通达明白。这与他的“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文质彬彬，然后君子”<sup>⑥</sup>的文质必须兼备的观点是一致的。在西方，与孟子所处的时代相近的亚里士多德，在他的名著《修辞学》中指出：“优良的风格必须清楚明白。”在他的另一名著《诗学》中又指出：“语言的生动性，是来自使用比拟的隐喻和描绘的能力……。”他也是在不同场合强调消极修辞和积极修辞这两方面的，只是用语不同罢了。到了十八世纪，意大利的美学家缪越陀里，干脆把“简洁、明晰”与“壮丽”一起，并列为美的因素<sup>⑦</sup>。现代苏联文学大师高尔基，一面指出“语言的真正的美，产生于言辞的准确、明晰和动听”<sup>⑧</sup>；一面又进一步指出了这两者的关系，“语言必须是朴素、明晰、精确、然后语言才优美和明白易懂”<sup>⑨</sup>。这种观点，我国现代作家也有阐述。例如老舍就指出：“讲究修辞并不是滥用形容词，而是要求语言准确而生动。”<sup>⑩</sup>毛泽东同志曾经指出，报刊的编

辑要“向作者提出写生动和通顺的文章的要求”<sup>①</sup>。以上事例说明，望道先生的观点既是对古人的继承，也与当代不少名家的看法一致。它们都反映了这样一个客观事实：修辞上的两大分野是存在的。所以望道先生解放后作了这样的总结：“两大分野完全可以包括一切修辞现象。任何事物都一分为二，不属这就属那。”

《发凡》对积极修辞手法的探讨，也比其他许多修辞学著作全面。它把辞格分为三十八格，对每一格的规律，都作了较为深入的研究，并且建立了一个较为完整的辞格系统。同时，对辞趣也作了专门研究。只是对消极修辞的探讨，相对来说比较薄弱，这是作者准备补充而来不及做到的。

第三，既重视总结文言文修辞规律，又重视总结白话文修辞规律。

在《发凡》问世前后的修辞学界，流行一种偏见，认为只有文言文才能修辞，白话文无法修辞。有些修辞学家公开宣扬这个观点。在《发凡》出版之前发行的一、二十本修辞学著作，绝大部分是用文言写的。有的“只是把古文中的有些话拿来解释解释”。有的干脆连解释也不解释。其中引用的例句，除个别修辞书从白话文中找了一部分外，几乎都是文言文。1923年出版的唐钺的《修辞格》，1932年1月出版的金兆梓的《实用国文修辞学》，前者用白话写成，后者用文言写成，但例句却都全部采自文言文。仅举两例，以见积习之深。

望道先生从“五四”运动开始，一直是努力推行白话文的闯将。1923年3月，他在《民国日报·觉悟》上发表的讨论文言白话美丑问题时说过，文言、白话都是工具，都只能给形成文章的‘美’构成‘方便’，它们本身并无美丑可言。但他一贯主张，“白话文是普及教育的利器”<sup>②</sup>，提倡“纯用白话”<sup>③</sup>。

他的观点是：对文言、白话的修辞都应该研究，不能厚此薄彼，但在当时，多研究些白话文修辞有好处。他在1962年写的《发凡·重印前言》中就回忆说，《发凡》的写作意图之一，是想同当时流行的“以为文言文可以修辞，白话文不能修辞”的“偏见”进行“论争”的，准备“运用修辞理论为当时的文艺运动尽一臂之力”。从效果来看，这一目的是圆满地达到了。

《发凡》中不但有大量的典型的文言文例句，也有大量的典型的白话文例句。白话文例句既从古代白话小说《儒林外史》、《水浒》、《红楼梦》、《老残游记》等作品中撷取，也从鲁迅等现代作家的作品中挑选。甚至还有从圣经《旧约》、翻译小说的白话译文里，以及民歌、成语、谚语中选择的。它们遍布在全书各个篇章之中。这些例句雄辩地说明，不论是文言文修辞，还是白话文修辞，都有规律可循。正因为如此，所以刘大白在《发凡》序言中，多次指出《发凡》是“中国有系统的兼顾古话文今话文的修辞学书底第一部”。

第四，既重视书面语修辞，又重视口语修辞。

这一问题与上面的问题紧密相联。由于白话文常常是言文合一的。写在书面上是书面语，讲出话来是口语。不承认白话文可以修辞的人，同时也不承认口语可以修辞。《发凡》在第一篇第一节，开宗明义地首先对这个问题进行了探讨。它指出：“在礼拜文言的时期，人们往往轻蔑语体、压抑语体，贬称它为‘俚语’、为‘俗语’。又从种种方面笑话它的无价值。而以古典语为范围今后语言的范型。其实古典语在古典语出现的当时，也不过是一种口头语言，而所谓修辞又正是从这个口头语言上发展起来的。无论中外，都是如此。”<sup>④</sup>这就清楚地指出，口语是“源”，书面语是“流”。不仅如此，它还进一步指出“文辞上流行的修辞方式，又常常是受口头语辞上流行

的修辞方式的影响的”，在表达形式上，“文辞和语辞的修辞方式又十九是相同的”。这样，根本没有理由把口语的修辞现象排除在外。《发凡》分析说，之所以会形成这一认识，完全是“礼拜文言时期的一种偏见”。这种看法并非始于当时，前人早就有了。例如顾炎武在《日知录》第十九中，就认为“从语录入门者多不善于修辞”。这种偏见的片面性显而易见。《发凡》指出，实际上，人们既然承认“口头语辞是达意传情的工具”，又常常讲“演说的修辞”<sup>⑮</sup>等等，就已经承认口语中也有修辞了。

《发凡》如此重视口语修辞，这在当时的修辞学界十分罕见。一般的修辞书都只谈书面语修辞，对口语修辞不置一辞，《发凡》慧眼独具，对修辞现象作了全面分析，这是很不容易的。

此外，《发凡》全面看问题的方面还很多。例如，它既重视用词、造句的修辞，又认为也要研究篇章的修辞。虽然它只是提出了这一问题，没有来得及进一步阐述，但依我们看来，作者在观点上，是从修辞的整体进行探讨的。既然修辞是研究整个语言调整的，目的是更好地为交际服务；那么，修辞研究为什么仅仅到句子就戛然而止了呢？这样做，符合不符合修辞现象的实际？既然篇章修辞也是一种修辞现象，在运用中又很重要，把它排除在修辞研究之外，是不全面的。另外，《发凡》既注意从文艺语体中总结修辞规律，又注意从其他语体中总结修辞规律，这也是全面性的一种表现。

## 二 事物与事物相联系的观点

列宁曾经说过：“规律的概念是人对于世界过程的统一和联系，相互依赖和整体性的认识的一个阶段。”<sup>⑯</sup>

望道先生研究文法、修辞，一贯讲究探索法则或规律。他

对规律的解释是：“所谓规律，就是事物的内在联系，就是客观的普遍的必然的关系。”<sup>⑮</sup>这个观点，与列宁的看法完全一致。

《发凡》对修辞规律的探究，也是根据上述原理进行的。它从事物与事物相联系的观点出发，既从修辞现象的内在关系中去寻求规律，也从修辞现象的相互关系以及它与邻近事物的关系中去寻求规律。这就比某些修辞书孤立地就修辞研究修辞高出一筹。这也是《发凡》科学性强的一个重要原因。这方面的表现很多，限于篇幅，这儿只谈下列几点。

第一，从语辞形成的整体中研究修辞。

《发凡》在全书《引言》中，专门列了一节来论述“修辞和语辞形成的三阶段”，把修辞放在语辞形成的整体中进行考察，这在当时的修辞学研究中，可说别具一格。

《发凡》认为，“语辞的形成，凡是略成片段的，无论笔墨或唇舌，大约都须经过三个阶段：一、收集材料；二、剪裁配置；三、写说发表。”修辞虽处于第三阶段，但与上两个阶段关系十分密切，没有前者就没有后者，它们是“顺次递积”的关系。这三个阶段都不是孤立形成的：“收集材料最与生活经验及自然社会的知识有关系。剪裁配置最与见解、识力、逻辑、因明等等有关系。写说发表最与语言文字的习惯及体裁形式的遗产有关系。”到了写说发表的时候，便已成为与生活、经验、自然社会的知识，“与见解、识力、逻辑、因明，与语言文字的习惯及体裁形式的遗产等等无不有关的条件复杂的景象”<sup>⑯</sup>。这就明确指出了修辞虽不研究第一、二两个阶段本身，但分析时还须考虑到这些因素。如果撇开这两个阶段不管，修辞是运用不好的。解放后，他在《谈谈修辞学的研究》一文中又补充说：“第一、二阶段是内容问题，第三阶段虽有形式

问题，但实际上仍决定于内容。不论那个大修辞学家，如果没有参加收集材料和剪裁配置，对内容不了解，是无论如何不能表达出所要表达的东西来的。”<sup>⑱</sup>从内容与形式关系的角度来看修辞所处的位置，这就比较客观，既不至于把修辞的作用不适当地夸大；又不至于看不到修辞的作用。

《发凡》对于修辞是这样描绘的：“材料配置定妥之后，配置定妥和语辞定着之间往往还有一个对于语辞力加调整、力求适用的过程，……这个过程便是我们所谓修辞的过程；这个过程上所有的现象，便是我们所谓修辞的现象。”<sup>⑲</sup>由此可见，修辞现象是在“材料配置定妥”之后，才产生的。但《发凡》又指出，这个过程之中的修辞现象并不轻而易举地产生，它又与作者对于“语言文字的习惯及体裁形式的遗产”熟悉与掌握的程度有关。修辞时这些因素会不知不觉地发挥作用。

总之，早在三十年代初，望道先生就正确指出了修辞与作者的立场、世界观、社会经验、生活经历、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知识、语文修养都有关系，没有马列主义的素养，是不可能有这样的认识水平的。

第二，从与题旨情境的关系中研究修辞。

这个问题与上述问题紧密相联。《发凡》在上一节之后，也专门列了一节来论述“修辞同情境和题旨”的关系。这在当时的修辞研究中，又是独树一帜的。

《发凡》指出：“修辞所须适合的是题旨和情境”，“题旨和情境可说是修辞的标准、依据”<sup>⑳</sup>。所谓题旨，就是“一篇文章或一场说话的主意或本旨”<sup>㉑</sup>。作者指出这个“主意或本旨”，在整个语辞形成过程中都发挥作用，不论是在收集材料、剪裁配置还是在写说发表中，都要时时刻刻考虑这一点。所谓情境，就是写说的目的、对象、时间、场合、上下文等因

素。在修辞时，这些因素也都在起着作用，同样应该重视。

《发凡》认为，所谓修辞，就是对应题旨，对应情境的语文运用。修辞技巧是怎么来的？它的来源有两个：“第一是题旨和情境的洞达，这要靠生活的充实和丰富”，第二才是“语言文字可能性的通晓”<sup>②</sup>。确实如此。对于题旨情境“洞达”的程度，是修辞能否产生预计效果的关键问题。“凡是成功的修辞，必定能够适合内容复杂的题旨，内容复杂的情境，极尽语言文字的可能性，使人觉得无可移易，至少写说者自己以为无可移易。”<sup>③</sup>由此推理，凡是不成功的修辞，除了未掌握修辞手法的规律外，很可能就是不适应题旨情境所致。

《发凡》还进一步提出了“修辞以适应题旨情境为第一义”<sup>④</sup>的观点，把它作为衡量修辞好坏的准绳，提到极为重要的高度来认识。解放后他又曾一再加以强调，在一次谈话中说：“修辞是变的，但我们要找出它不变的东西。……这不变的东西就是规律，是修辞要依据题旨和情境。”他在另一次谈话中又说：“研究任何学问都要找出一个关键性的东西来。文法讲组织变，修辞讲题旨情境变。”由此可见，他不但认为适应题旨情境乃是修辞研究中的一条规律，而且强调这条规律是修辞研究中的“关键性”问题。

第三，在研究修辞的同时，也要研究相邻学科。

修辞学的性质十分特殊，它与相邻学科的关系十分密切，是一门边缘科学。必须吸收相邻学科的研究成果来丰富自己。望道先生有一次谈到他自己的研究经验：“我搞了十几年马列主义、逻辑学、心理学、美学，才写出《发凡》来。”在别的场合他还说过，研究修辞必须研究文艺理论、文章学和语言学的其他分支，如语音学、词汇学、语法学，等等。实际上他自己多年来一直是这样做的。下面逐项论述。

( 1 ) 修辞学和哲学、逻辑学。望道先生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時間很长，成绩很大，已如前述。他的专著《因明学》早在1930年即已问世。同时他还翻译过《社会意识学大纲》、《伦理学底根本问题》等书。对于逻辑学，他说过：“研究修辞的人特别要学学逻辑。有许多问题，不学逻辑就发现不了。”<sup>28</sup>有些修辞现象必须符合逻辑，而有些修辞现象又是违反逻辑的，只有具备了逻辑知识，才能分清它们。

( 2 ) 修辞学和美学。望道先生在“五四”之后不久就开始研究美学。他是把美学作为“修辞学研究底副业”<sup>29</sup>来研究的。他对美学兴趣很浓，不但于1926年出版过美学专著《美学概论》，写过美学论文《美学纲要》等，还翻译过《艺术简论》、《艺术社会学》、《实证美学的基础》等多本美学著作。他不但把美学理论运用到修辞理论中，还把美学原理运用到修辞手法的分析上，收效显著。

( 3 ) 修辞学和心理学。望道先生说：由于过去“美学研究心理，我又去学了心理学”<sup>30</sup>。心理学知识对他的修辞研究十分有利。例如“意境上的辞格”，系“指就心境意境而行的修辞”<sup>31</sup>，其中不少都从心理学上加以论证。

( 4 ) 修辞学和文艺批评。望道先生认为，修辞是讲究语文评判的，文艺批评是对文艺问题的评判，所以他“先研究文艺批评”，再研究修辞。他甚至持“修辞是文艺批评的一种”的观点。因此他说：“学修辞要多看一些文艺作品，要学文艺理论，要学美学，也要懂得哲学……。”他在二年代初就在《民国日报》副刊《觉悟》等报刊上发表了文艺评论方面的文章多篇。他翻译的《文学及艺术之技术的革命》于1928年出版。二、三十年代他编辑过多种文艺书刊，如《文艺理论小丛书》、《艺术理论丛书》、《大江月刊》、《文艺研究季刊》、

《文学月刊》、《太白》半月刊等。文学知识有助于他修辞研究的深入。

( 5 ) 修辞学和文章学。望道先生很早就研究文章学。据乐嗣炳教授回忆, 1920年, 他们刚认识时, 就谈论文章学。乐先生说: “我向他请教写作方法, 望道同志指着桌上的《文章轨范》说: ‘谢枋得提出的放胆、小心是写文章的关键。’”<sup>⑳</sup>这说明望道先生对宋朝谢枋得的文章学著作早有研究。1921年他即在复旦大学讲授作文法, 次年就出版了《作文法讲义》, 这本书可说是他写作《发凡》的准备。他是先研究文章学再研究修辞学的, 这两门学科的关系十分密切, 其中相通之处很多。

( 6 ) 修辞学与语音学、词汇学、语法学。翻阅《发凡》中的辞趣和某些辞格部分即可看出, 没有语音、词汇、语法知识, 是不可能分析得如此透彻的。尤其是对于语法学, 他认为在修辞研究的同时应该给予格外重视, 因为“两者的关系是很密切的, 并进而可以使我们的研究更为周到全面”<sup>㉑</sup>。

如果联系本节开头所引的列宁同志及望道先生的见解, 可以认识到, 本节所论及的三大部分, 都是阐述修辞和其他事物的联系的, 其实这都是在总结修辞规律。把修辞规律的总结局限在修辞格的范围之内, 是十分狭隘的。《发凡》冲破了这种传统的观念, 取得了可喜的成就。

### 三 发展变化的观点

望道先生把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变化观点也应用到修辞研究上, 这就在修辞现象的分析上, 有不少独到之处。这在第二篇第九节《汉语文变迁发展的大势》和第十篇《修辞现象的变化统一》中, 有集中的反映, 在其他篇章中, 也有一定体现。突出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